

巴贝夫研究的演进

端木正

自从巴贝夫领导“平等派密谋”以来，一百八十多年过去了，但是关于这位共产主义先驱和“第一个行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研究进展得十分缓慢，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取得重大的突破。本文在介绍巴贝夫史学的新发展以前，简要地追述有关巴贝夫研究的演进过程。

一

巴贝夫和他的战友们在旺多姆受审判期间和被判决以后，督政府及其高等法院就不断公布对他们的起诉书和有关文件，其用心当然是为了制造迫害巴贝夫的舆论，诬蔑平等派的革命活动，为它们进行司法镇压的罪行辩护。巴贝夫被捕时在他的住处所没收的一切文件也同时被公布出来。这些官方出版的文件现在完整地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和国立图书馆。与此同时，巴贝夫在狱中也非常重视保存和发表自己的辩护词，付托可靠的战友出版这些光辉的文件。在审判期间敌、我、友三方面的报纸对这个案件的报导和评论现在也都经过研究。因此，有关旺多姆审判的史料基本上保全下来。

但是，这些文献还不足以阐明平等派运动的历史，官方文件固不待论，甚至巴贝夫和他的战友们在敌人法庭上慷慨陈词时，为了策略的原因，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全部思想和活动。

直到巴贝夫就义三十一年以后，才出版由他亲密战友之一菲立普·邦纳罗蒂（一七六一——一八三七年）在长期流亡中写成的《平等派密谋，即巴贝夫密谋》（以下简称《密谋》）的名著。一八二八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后，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在巴黎就翻印出版，以后又有重版和摘要版，但都印数不多。这部名著是平等派运动的正史，是著者个人的回忆录，也是这一运动的重要文献汇编。它对布朗基和法国七月王朝末期的新巴贝夫主义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密谋活动起了指导作用，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前各国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必读书。一八三六年在伦敦出版了由宪章派领导人之一勃朗代尔·奥布恩翻译的英译本，邦纳罗蒂给英译者的信发表在译本的前面；这也是他生前所能看到的唯一外文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多次提到这部书，并且非常珍惜保存这部书。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向保尔·拉法格索回借阅的这部书时说：“邦纳罗蒂那本现在买不到了”^①。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密谋》长期成了罕见书。

邦纳罗蒂这部杰作表明他不仅是平等派的重要领袖之一，而且成为这次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史学家。但是，《密谋》毕竟是在平等派失败后三十一年才出书的，著者是否忠实地反映出当年的活动和思想，还是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他个人以后的经历和看法，这是后世学者理所当然要怀疑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邦纳罗蒂是很能忠实于历史真象的；然而也可以看出，书中所表达的某些看法只是他个人的，并不能完全代表巴贝夫或其他战友，例如他对罗伯斯比尔的推崇。其次，邦纳罗蒂是在一七九五年九月到巴黎监狱中才结识巴贝夫的，十月

出狱，到次年五月又同时被捕，共同战斗只有八个多月，故而对巴贝夫早年的思想和活动所知毕竟不很详细。《密谋》中对巴贝夫的介绍具有重大的证据价值，而所述巴贝夫诞生于一七六二年则是不确实的^②。有关巴贝夫的生平固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就是邦纳罗蒂本人的生平在他的《密谋》中也只显露出很小一部分。他的革命活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国际联系非常广泛，种种经历很不平凡，而一百多年来各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并没有开展深入的探讨。

二

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第一批巴贝夫传记材料都是由地方史研究者写的。一八四九年在里昂出版了艾·弗勒里写的《巴贝夫传。革命研究》，继之出版的是艾·柯埃的小书《巴贝夫在鲁耶城》（佩罗纳，一八六五年）和两卷本的《鲁耶城史》（巴黎，一八八〇年）。一八七五年，维·德·博维莱出版了两卷《蒙迪迪埃城史》。这些书的著者观点反动，柯埃甚至污蔑、辱骂巴贝夫，但是他们都着手蒐集了巴贝夫早年在皮卡底省各地活动的史料，柯埃找出了巴贝夫的出生证书和结婚登记，首次确证了巴贝夫的出生和结婚日期；他们也发表了零星的巴贝夫著作。但是他们也只发掘出大量分散的地方史料的很小一部分而已。

这些地方史的研究者并不知道，当时整个史学界也还不知道，巴贝夫有计划地保全了自己全部的文稿和往来书信。巴贝夫本人曾多年从事“封建制律师”业务，深知保存文件档案的重要性，因此对自己的手稿系统地收存起来。这批文献是怎样被巴贝夫的亲人和战友历尽艰辛、奇迹般地保全下来，现在已经难以推考详细的经过。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巴贝夫的异常丰富的私人档案辗转落到了收藏家波什—德罗什的手里，此人是玻璃和瓷器制造业的巨商，同时酷爱珍藏法国大革命的书信、小册子、传单和手稿，本人长期多方觅寻，还收购其他小收藏家的成批文物。到一八八一年此人逝世后，全部收藏被后人公开拍卖，从拍卖目录上看出有关巴贝夫的文献达一千多件，包括一百多封家书和巴贝夫主编的各报，可惜的是拍卖目录没有详尽地一一列出全部文件的内容和准确数量。

第一个利用这批珍贵文献的史学家是维克多·阿得维尔，他在一八八四年出版两卷《格拉古·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史。根据许多未发表过的文件》，由他个人出版，只发行了三百份。阿得维尔的书成为平等派历史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在此后半个世纪里是研究巴贝夫的主要依据。他的书第二卷是文献汇编，其中包括一七八六到一七八八年巴贝夫和阿腊斯科学院常任秘书杜布瓦·德·福塞的部分通信，这些书信初次提供了研究大革命前巴贝夫早期思想的可靠史料。但是，令人惋惜的是阿得维尔并没有充分利用经过他手里的巴贝夫全部文献，他所编选付印的只是一部分，转抄也有差误。波什—德罗什死后，这份巴贝夫私人文献在一八八三年一月被另一个收藏家、出版商和史学家艾蒂安·夏拉维收购，他又陆续公布了一些阿得维尔所未发表的文件，但他的后人曾分散售出这份宝藏的一部分。因此，只有阿得维尔是唯一的曾完整地接触过这份宝藏的史学家。阿得维尔长期担任地方行政官吏，从事撰写地方名人传记，对史学并非外行，但他并不是有专业训练，也不曾对法国大革命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有较深的造诣，晚年到巴黎财政部做官，在出版了两卷大著后并没有继续致力于这一专题的深入研究。当然，我们无意因此否定阿得维尔在巴贝夫史学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只是惋惜他原可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已。

阿得维尔这样的官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从事巴贝夫的研究不是偶然的。

正是当时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引起了对平等派历史的广泛注意。一八七七年十一月盖德派创办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就命名为《平等派》，从创刊号起就开始连载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德维尔撰写的《巴贝夫密谋》，盖德不止一次公开宣称巴贝夫是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先驱。拥护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双方都在巴贝夫评价问题上展开攻势。随着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和分化，巴贝夫的研究也在各派不同立场的斗争中曲折前进。

一八九八年出版的艾斯皮纳斯著的《十八世纪的社会哲学与大革命》是站在反革命立场敌视巴贝夫的，但他从艾·夏拉维处得到一七九一年十月巴贝夫致顾贝方丈的信，首次发表这封信大有助于了解在大革命初年巴贝夫思想的发展。饶勒斯主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通史》这一巨著的前四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出版）是他本人执笔的法国大革命史，在历来法国革命史的著作中，从来没有象饶勒斯这样推崇巴贝夫的。第五卷《热月反动与督政府》（一九〇四年出版）是由加·德维尔执笔的，他利用了一些新发现的外省文件。在第二国际并非无名之辈的阿尔培·托马也在一九〇四到一九〇六年间发表几篇有关巴贝夫社会思想的文章。这些人在颂扬巴贝夫的同时，暴露出他们曲解巴贝夫的革命精神，甚至片面利用巴贝夫为他们的阶级投降主义辩护。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关巴贝夫的新文件出现很少。一九一二年出版的乔治·桑西埃著的《巴贝夫身后的巴贝夫主义》，是研究巴贝夫主义影响的第一部著作。一九一三年出版的阿·帕图著的《格拉古·巴贝夫的伪造案》一书中首次发表了巴贝夫在一七八八年七月致苏瓦古侯爵的信和一些地方文件，但是著者是反动地解释这些文件。

在法国以外，巴贝夫的研究也在逐渐展开。一八八七年，在瑞士出版了爱·伯恩斯坦译成德文的十年前德维尔写的《巴贝夫密谋》的小册子。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塔尔列写的《巴贝夫的事业》是俄国第一篇关于巴贝夫的著作，塔尔列完全依据阿得维尔两卷书提供的材料。一九〇九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邦纳罗蒂的《密谋》一书的德译本。一九一一年在英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福特·巴克斯的通俗著作《法国大革命的最后片段》，它是英国关于巴贝夫的第二部著作，而第一部还是远在一八一七年出版的赫尔绍夫的《和平共和派手册》中所选辑的从巴贝夫住处搜查出的一些文件。

简言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巴贝夫研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史学界的重视，一百二十年的巴贝夫研究进展缓慢，史料残缺，著作稀少，成为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冷门。仅有的两部重要著作，即邦纳罗蒂的《密谋》和阿得维尔的两卷巨著，都只是流传不广的罕见书。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巴贝夫研究引起比较广泛的重视。在法国和苏联，有关文献的蒐集和史学的论著都取得显著的进展。

法国革命史学一代权威亚尔培·马迪厄在一九一七年发表了《巴贝夫与罗伯斯比尔》^③，以后在历年授课讲义中和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戈德肖整理出版的《督政府》（一九三四年）都对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有所论述，他的主要论点是从他推崇罗伯斯比尔的总的看法出发，否认共产主义思想在密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平等派运动受罗伯斯比尔派影响的一面。马迪厄的论点虽然为以后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所推翻，但是他所整理出的史料和对巴贝夫研究的倡导仍然功不可没。

对巴贝夫研究作出更大贡献的是法国工运史专家莫理斯·多芒热，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

《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一书(一九二五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俄译本)以后,论著甚多。经过长期的准备,他在一九三五年出版了《巴贝夫选集》^④,列入马迪厄主编(一九三二年起由乔治·勒费弗尔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古典著作丛书”之一。多芒热的贡献不仅在于蒐集了当时在法国所能找到的巴贝夫著作,发掘出许多从未发表过的文件,而且在于对巴贝夫著作的考订和注释,功力之深和态度谨严远远超过阿得维尔。多芒热编注的这部选集出版四十年来一直是研究巴贝夫的最主要的依据,即使在一九七七年开始出版全集(见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参考价值。但是多芒热在《选集》的导言中也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他不能利用波什——德罗什所拥有过的巴贝夫私人档案,这份珍藏的大部分当时已被苏联收购去。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非常重视共产主义先驱思想家的研究。一九二三年出版了邦纳罗蒂的《密谋》俄译本,但不是全译而是根据一八六九年法国摘要版译出的。一九二二年维·彼·沃尔金著的《巴贝夫主义思想的遗产》出版以后四十年沃尔金继续研究巴贝夫思想。他着重指出,巴贝夫思想中可贵的贡献是在革命成功后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须实行革命的专政。

一九二一年列宁指示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即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负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著作,这个学院内的法国史中心致力于蒐集法国革命史文献,尤其着重巴贝夫的文献。该学院派遣专人到法国收购文献资料,一九二五年底到一九二六年底初,首次收购到三十二件巴贝夫手稿。一九二七年是巴贝夫就义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日,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举办了一次专题的文物展览会。会前该学院决定进一步去追踪收购艾·夏拉维所购得的波什——德罗什的珍藏。苏联派人找到夏拉维的后人,探知巴贝夫私人档案已分别售出,最大的买主是收藏家亨利·罗兰。到一九二七年初谈判成功,苏联总共收购到八百五十八件手稿和其他文件,比起半个世纪前阿得维尔所利用过的波什——德罗什珍藏,已经散失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该学院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派人到法国各地搜寻购买,或摄制复本。最后该学院总共收藏约九百份巴贝夫的手稿,再加上其他有关巴贝夫的文献、报刊、著作等等,使该学院拥有的巴贝夫研究资料超过法国。但是,我们至今难以理解的是:何以沃尔金和其他苏联史学家长期未能利用这一珍藏,直到五十年代中叶才被达林首先整理使用并公诸于世。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头十年,巴贝夫研究处在恢复阶段,最近二十多年则突飞猛进,以致我们可以说,巴贝夫研究已经面目一新。

乔治·勒费弗尔在一九四五年发表了《涉及巴贝夫的一个问题》,一九五〇年又发表了《巴贝夫共产主义的起源》^⑤,这两篇文章都很有启发性。勒费弗尔认为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来源于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皮卡底省农村的村社传统,而且说巴贝夫的理想只是“分配的共产主义”这种看法引起讨论。勒费弗尔对巴贝夫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个别文章或论点,而且在于他的倡导之功和帮助年青一代学者开展研究^⑥。

一九四九年法国出版的若瑟特·莱萍著的《巴贝夫传》虽然不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却能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写得通俗,并且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比起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热·瓦尔特写的《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一书来(此书贬低巴贝夫,史实不确,学术水平不高),莱萍的书值得一读。当然,今天看来莱萍的书已经过时。

战后初期巴贝夫研究中大有进展的是关于他的战友邦纳罗蒂的研究,直到一九六〇年前

后史学界的注意力才回到巴贝夫本人。

邦纳罗蒂的经典性著作《密谋》在一九四六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一九四八年出版了俄文全译本，沃尔金为这个译本写了导言^⑦。关于邦纳罗蒂的研究最盛的是在他的原籍意大利，本文不可能将战前战后邦纳罗蒂研究的成果详细介绍，只能举其荦荦大端，略见一斑而已。

首先研究邦纳罗蒂生平做出贡献的是马迪厄的意大利学生比亚·翁妮思，她在一九三七年起发表关于邦纳罗蒂在一七九四至一七九六年与意大利“爱国派”的联系和这一时期邦纳罗蒂的社会思想。亚·加朗特——加隆纳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了《邦纳罗蒂与巴贝夫》，探讨了邦纳罗蒂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肯定他的《密谋》不是表达他一八二八年思想，而是忠实于一七九六年的理想。三年以后，加朗特——加隆纳又出版了《邦纳罗蒂与十九世纪的革命家》一书（一九七五年出版了法译本）着重写一八一五年以后邦纳罗蒂与法、意、荷、英等国革命家的联系和平等派思想的传播。另一位意大利史家亚·萨义达也写了两卷《菲立普·邦纳罗蒂》（罗马，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他不同意加朗特——加隆纳的结论，他认为邦纳罗蒂的《密谋》表达的不完全是一七九六年时的看法。两位意大利史家的劳动并不重复，萨义达不是系统写邦纳罗蒂传记，而是重点研究某些问题，如对一七九三年邦纳罗蒂在萨丁岛的活动，以至一七九六年与意大利“爱国派”的联系，都很有创见。

在美国也先后出版了两部传记，一部是萨·伯恩斯坦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邦纳罗蒂传》（一九四六年译成意文，一九四九年译成法文）。另一部是伊莉沙白·艾森斯坦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菲立普·邦纳罗蒂》，此书除了所附参考书目非常完备外，内容并无新的贡献，而且著者既未能论证邦纳罗蒂是个“职业革命家”，也不能论证是其中的“第一个”。

除了邦纳罗蒂以外，《平等派宣言》的作者锡尔万·马雷夏尔有莫·多芒热写的一部完整的传记，一九五一年出版。

一九六〇年是巴贝夫诞生二百周年，一九六一年是邦纳罗蒂诞生二百周年，在纪念活动开展时，巴贝夫的研究又达到了新的高潮。

五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研究巴贝夫热潮是由法国和苏联几乎同时发掘大量新的史料而推动起来的。一九六〇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各国史学家参加巴贝夫学术讨论会提出了许多论文，新的研究成果辈出。主要的收获一是对巴贝夫早年的生活和思想形成的过程，对他在大革命期间在故乡的革命经历，基本上了解清楚，这是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所只能模糊知道一些的；二是整理出版了过去非常分散的巴贝夫著作，为今后巴贝夫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苏联在二十年代末收购到绝大多部分巴贝夫手稿后，直到五十年代中才由莫斯科大学的达林整理利用，写成论文多篇。第一篇是一九五六年发表在苏联《历史问题》上的《一七八九至一七九〇年的巴贝夫与马拉》^⑧，接着达林还整理发表了不少巴贝夫的手稿；一九六〇年在斯德哥尔摩讨论会上，他的论文是《法国革命前夕巴贝夫的社会思想》。到一九六三年他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就是汇集将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法国大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巴贝夫》（全书六百一十六页；一九七六年译成法文）。他充分利用未发表过的巴贝夫手稿和近年新出的文

献，即使他的某些论点引起国内外专家的讨论，这部著作是研究巴贝夫生平的最详尽的新成果。

上文已经提到，一八八四年阿得维尔首次发表了部分的巴贝夫和阿腊斯科学院常任秘书杜布瓦·德·福塞的通信。巴贝夫是在接到德·福塞的来信背页上起草复信稿，阿得维尔就是根据这些草稿发表的。但是一九六〇年德·福塞的后人将全部家存档案请一位贝尔特方丈整理，这时才发现巴贝夫给德·福塞发出的全部信件。已故的巴黎大学教授马塞尔·雷恩哈主持编纂了《巴贝夫和阿腊斯科学院通信集(一七八五——一七八八年)》(一九六一年出版)，并将阿得维尔已发表的巴贝夫信稿加以对照，而这些信稿的原手稿则存在苏联，当时雷恩哈还无从利用。自从阿得维尔发表部分通信以来，世人一直以为德·福塞对巴贝夫如此友善，频频通信，讲学论道，现在德·福塞的全部档案公开才知道，他联系的面非常广，他写的信大都是一式多份，巴贝夫不过是收信人之一而已；而巴贝夫对复信则极为慎重，先起草再抄录，最后发出的信往往比草稿有所修改。这些信件帮助我们了解巴贝夫读过什么书，考虑过什么问题，早年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发掘巴贝夫著作和有关文献的另一努力方向是深入搜寻地方档案，在这一方面最有成就的是罗贝尔·勒格朗。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往往在尘封灰积的旧档中沙里淘金。勒格朗持之以恒，不断发表新的文献，在一九六一年写成《巴贝夫的思想和在皮卡底的生活》，近年发掘的重要文献是从巴黎城历史图书馆找出一份共和三年葡月巴贝夫的手稿、九封巴贝夫写的或收到的信(发表在一九七三年《法国革命史年鉴》杂志)。一九七六年又发表了多年清查的结果《巴贝夫的牢狱统计》，初次查清了巴贝夫从一七九〇年五月第一次被捕到就义的七年中，共入狱三十二个月，住过十三个监狱，九个在巴黎(其中一次尚待查)、四个在外省。

一九六〇年在斯德哥尔摩讨论会上通过决议，各国学者合作出版巴贝夫的全集，公推法国的索布尔、苏联的达林和意大利的萨义达主持这项国际合作项目。他们三人在各国学者支持下，到一九六六年编出《巴贝夫手稿和已出版著作总目录》，长达二百二十页，将已查明现存在法、苏、意、荷、美等国巴贝夫手稿和著作名称和收藏单位开列了总清单，公开发行，广泛征求补充意见。此后又不断有地方文献发现。到一九七五年首先出版《巴贝夫全集》俄文版第一卷，一九七六年第二卷出版，一九七七年出版第三卷，法文版第一卷也于一九七七年出版，共四一二页，全书有三篇导言，第一篇是索布尔写的《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平等派密谋》，第二篇是奥尔加·塞内奇娜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所藏巴贝夫档案的来历》，第三篇是达林写的《大革命前的巴贝夫》。第一卷始自一七七九年五月止于一七八九年十二月。这部用两种文字发行的四卷本的《巴贝夫全集》正在继续出版中。三位编辑对巴贝夫著作加了大量考证和注释材料(主要是萨义达之功)，每章之前又有说明，帮助读者了解原著，贡献是很大的。

在《全集》出版之前，法国社会出版社的“人民古典丛书”先后出版过两种《巴贝夫文选》，一九五一年出版由热尔梅娜·韦拉尔和克劳德·韦拉尔合编的《巴贝夫文选》^⑥，选文不到七十页，是语录式按主题分类选辑的。出版后不到十年，未发表过巴贝夫著作相继涌现，这个选本就已过时。同一出版社在同一丛书又约克劳德·马佐里克新编《巴贝夫文选》，于一九六五年出版，选文近二百页，按时间顺序编排。现在《巴贝夫全集》四卷行将出齐，预料不久又将有新的选本出现。

一九六〇年斯德哥尔摩讨论会的论文是当代各国巴贝夫专家的研究新成果，主要的论文

先发表在《法国革命史年鉴》杂志一九六〇年第四期(十至十二月号),一九六三年在巴黎出版了全部论文《巴贝夫与巴贝夫主义问题》。一九七〇年,莫理斯·多芒热选编了他将近半个世纪来发表的论文集《论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这两部论文集成为现在研究巴贝夫的必读书。

随着新出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综合这些成果的通俗学术著作也相继出现。克劳德·马佐里克写的《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巴黎,一九六二年,二四六页)是能吸收斯德哥尔摩讨论会新成果的全面论述。罗思的《格拉古·巴贝夫传》(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一九七七年)是将这些新成果介绍给英语读者的第一部书,虽然著者的观点颇多引起争论之点。最新的这类著作是让·勃吕阿的《格拉古·巴贝夫与平等派或“第一个行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巴黎,一九七八年,二四八页),这本书能做到深入浅出,插图较多,最后还用十一页列举了现在巴贝夫研究中有哪些争论(虽然著者在正文中已采取了一定的看法),哪些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很完备的参考书目。因此这本书对于一般读者作为入门书固然有益,对于史学家也大有参考价值。

在苏联,沃尔金院士晚年继续对巴贝夫进行研究,一九六〇年出版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一书第五七至八六页较详尽地评述了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一九六一年在苏联《近现代史杂志》第二期又发表了《巴贝夫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不长的论文,这是他最后的一篇总结性的著作。一九六三年又出版了邦纳罗蒂《密谋》的新译本,由达林新加注释。另一位苏联专家阿·约安尼相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一书则不顾达林大著的看法,认为巴贝夫直到一七九三年仍然是平均主义者,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关于巴贝夫共产主义思想何时形成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巴贝夫生平与平等派运动的问题,在各国学者之间仍然存在许多争论,《巴贝夫全集》的出版使这些讨论更加深入,但不可能结束一切争论。巴贝夫研究还在继续从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展中。

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46页。

② Buonarroti, *Conspiration pour l'Egalité, dite de Babeuf*. Réédition en deux tomes, Paris, 1957. (邦纳罗蒂:《平等派密谋,即巴贝夫密谋》,1957年重版,巴黎)(见上卷,第70页。)

③ 汉译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外国史学摘译》,第5期,1977年12月出版。

④ M. Dommanget, *Pages choisies de Babeuf*. Paris, 1935. XI + 330p.

⑤ 勒费弗尔这两篇文章都收在1954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丛》(*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P. U. F. 1954)一书中。

⑥ 关于勒费弗尔在这方面的贡献,让·多特里在他逝世后的纪念文章作了综述: J. Dautry, *Georges Lefebvre et le Babouvism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159 (Jan.-Mars, 1960)

⑦ 这篇导言的汉译本《“平等派”运动及其社会思想》载《论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197—218页。

⑧ 汉译见中山大学出版《世界近代史参考资料选集》(第二辑,1964年),第102—120页。

⑨ 汉译的这个选本,一九六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在一九五六年德译本转译而来。